

论吴趸人《新石头记》中的未来构想与士人焦虑

张博洋

思潮的动态认知过程。创作初期，他显然深受梁启超“小说界革命”理念影响，字里行间满是对变革的认同。小说中，贾宝玉在故纸堆中偶遇《时务报》《知新报》等维新报刊，由衷感叹“觉得十分合意”，这几乎是作者本人思想倾向的直接投射——前半部分的叙事，俨然是向社会改良运动呈上的一份精神献礼。

然而，随着时局演变，吴趸人的态度逐渐转向审慎。他从维新理念的热情拥护者，转变为对制度移植效用之深刻怀疑者。在小说后半段，他借人物之口批判：效仿西方议会制难免滋生派系纷争，最终不过是“旧权威换新知本”。^①，由富人阶层掌控权力。他尖锐指出，若缺乏“德育”作为根基，任何制度革新都可能沦为闹剧，其危害甚至比旧式专制更隐蔽。这种思考使其偏离了维新派主流论调，而这并非简单的思想倒退，而是旧式文人对西方模式移植风险的敏锐洞察——他警惕制度变革与文化传统的脱节，担忧社会陷入无序动荡。

最终，吴趸人在小说中提出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“开明君主制”：先以强力引导提升国民道德水准，再回归理想化的圣贤治理。这一构想在今日看来或许天真，但置于其个人经历与时代局限中便不难理解：吴趸人曾祖父吴荣光官至湖广总督，祖父、父亲均为小官吏。吴趸人曾拒绝清政府经济特科考试，绝意仕途，只靠卖文所得度日，一生清贫。他的出身背景及教育环境等决定了其为旧时代知识分子，具有自身无法突破的局限性，对传统秩序的依赖近乎本能。书中从拥护变革到退守传统的摇摆，本质上是新旧思想碰撞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。

三、时空幻游：二元对立中的文明镜像

《新石头记》对未来文明的构想，依托于精巧的时空叙事设计，其核心是“文明”与“野蛮”的二元对立结构。小说中，贾宝玉经历两次“穿越”：先是从《红楼梦》的旧梦进入晚清现实，再由现实跃入未来“文明境界”——这种“未来完成时”的叙事，明显可见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的影响。

“文明—野蛮”的二分法，本是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东传的产物。吴趸人借用这一框架，将晚清中国的“落后”“守旧”与未来中国的“进步”“文明”进行鲜明对照，以此激发读者对革新的向往。但小说结尾却弥漫着浓重的悲观：当贾宝玉在未来中国看到镜像“甄宝玉”主持万国和平会议时，却骤然从乌托邦大梦中惊醒。这一结局暴露了吴趸人的深层迷茫——作为思想先行者，他虽勾勒理想图景，却无法找到实现路径，只能将“补天”重任寄望于“后来者”。

在叙事视角上，吴趸人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，全书所见所闻均通过贾宝玉的眼睛呈现。这位“古代闯入者”的目光自带“局外人”的审视性：初见西餐时的手

足无措、面对轮船时的惊叹，都形成了文学“陌生化”效果，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现代事物。而宝玉对“中国船为何由洋人驾驶”的诘问、对国人追捧洋货的忧虑，则直接映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的集体矛盾——既渴望学习西方，又唯恐丧失文化主体性。

四、梦醒怅惘：士人精神困境的文学投射

贯穿《新石头记》的，是一种深刻的时代焦虑。昔日耽于风月的贾宝玉，在清末变局中被重塑为肩负“补天”使命的批判型知识分子——他要补的“天”，正是严复《天演论》中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残酷世界。面对西方文明冲击，宝玉的心态从惶惑到审慎，再到主动探索；他研读新式报刊、考察现代工厂、学习外文，践行“师夷长技”理念，却始终坚守中国本位的思考。这种“拥抱与抗拒”的徘徊，正是清末知识分子集体心态的缩影。

这份焦虑在小说后半段的乌托邦幻想中达到顶点。在“文明境界”里，中国掌握了远超西方的科技：潜艇、飞行器一应俱全，甚至有能驱邪向善、灌输智慧的神奇仪器。这种夸张的科技想象，本质上是文化补偿心理的投射，越是强调“超越西方”，越暴露深层的自卑与不安。而作者对“留洋归来却性质劣浊”学生的挞伐，更射出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忧虑：将国家命运寄托于“灌输智慧”的幻想，则暴露了救亡压力下的急切与非理性。

综上，《新石头记》以“拟旧出新”的独特手法，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据特殊地位。它既是天马行空的幻想作品，也是深刻的文明寓言。而吴趸人本身恰可被看作一些晚清知识分子的集体写照——他们具备现代意识，却难以割舍对传统权力结构的依赖；渴望变革，却受限于知识结构与时代条件，只能在理想与现实间摇摆，使空想小说成为他们安放忧患之“避风港”。透过以吴趸人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的局限性，我们可以深刻地发现：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引，救亡图存的朴素热情与思考根本无所依托、无处着力；没有坚强有力的正确的领导与组织，就无法找到奋斗的方向，更谈不上落于实践的探索。

吴趸人就像晚清社会的“堂吉珂德”，满怀爱国热情，在小说中动辄挥舞传统道德的长矛，去冲刺他看不惯的一切人和事。即便他终究被历史证明为一名“落伍者”，其精神依旧可贵。正如在《新石头记》的结尾，我们绝不能因“补天”功业最终由“甄宝玉”完成，就抹杀先行者贾宝玉的努力。《新石头记》这部作品的价值，不在于提出的方案是否可行，而在于真实记录了转型期旧式知识分子的精神阵痛与思想求索。在新旧交替、中西碰撞的十字路口，《新石头记》以文学实践生动展现了晚清文人“想象中国”的艰难历程。

（作者单位：苏州大学文学院）

以教育家精神赋能思政课教师能力提升

郭佳琪 丁闪闪

2023年9月9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首次提出、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内涵，即“心有大我、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，言为士则、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，启智润心、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，勤学笃行、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，乐教爱生、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，胸怀天下、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”。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，而“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”。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师成长全过程，能推动教师从“知识传授者”向“育人引领者”转变，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。

一、锚定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涵，筑牢教师成长之“魂”

思政课的本质是“讲道理”，核心是“育新人”，教育家精神为思政课教师明确了“为谁教、教什么、怎么教”的价值遵循，构成其能力提升的“精神内核”。

其一，坚定的育人初心是根本立场。教育家至诚报国的崇高追求，与思政课“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”的使命高度契合。这要求思政课教师始终坚守正确政治方向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让思政课成为传递理想信念的主阵地。

其二，深厚的专业能力是核心支撑。教育家以扎实的学识和精湛的教艺赢得学生认可，思政课教师同样需要“双过硬”的专业能力：一方面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，吃透党的创新理论精髓；另一方面要掌握教育教学规律，懂学生、善引导，让理论讲解更具说服力。

其三，鲜明的创新意识是活力源泉。教育的本质是与时俱进的事业，教育家从不墨守成规。随着时代发展，教师的认知习惯、信息接收方式不断变化，思政课教师需主动探索教学内容、方法与载体的革新，让思政课既能守正任理论根基，又能紧跟时代步伐、贴近学生生活。

其四，强烈的使命担当是精神底色。教育家始终以推动教育发展、培育时代新人为己任，这种担当精神对思政课教师尤为重要。思政课承担着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，教师需主动扛起这份责任，敢于直面教学中的难点问题，在复杂社会思潮中为学生驱散迷雾、指明方向。

基于汉字构形学理论的初等手写汉字教学探究

陈李娜

汉字构形学理论能够为系统认识汉字结构体系提供重要支撑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在《汉字构形学导论》中，系统阐述了汉字构件的表形、表义、示音及标示四大结构功能。基于这一构形学理论分析汉字的构形特点，可以为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手写汉字教学提供一些建议。

《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》包含300个初等手写汉字，虽然字数较少，但这类汉字构词能力强、使用频率高，在教学中需高度重视。结合王宁的汉字构形模式，并考虑到汉字表形功能渐趋淡化的特点，可将《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》中的初等手写汉字归纳为全功能零合成语、标义合成语、标音合成语、义音合成语和会义合成语五类，具体分类及特征如下。全功能零合成语：仅由一个完整构件构成。初等手写汉字中共有70个此类汉字，部分为传承至今的象形字或指事字，例如“人”“上”。标义合成语：由表义构件与标示构件结合而成，核心作用是明确新字与既有字在意义上的区分。初等手写汉字中包含“少”“木”“本”三个标义合成语。标音合成语：通过示音构件与标示构件的组合，标明新字与旧字在读音上的关联。初等手写汉字中仅有“百”一字属于此类。义音合成语：由表义构件明确字义范畴，示音构件提示读音，是初等手写汉字中的核心类型。其中，左形右声结构的义音合成语有84个，占初等手写汉字总数的28%，如“忙”“妈”等；左声右形、上声下

形及上形下声结构的汉字，每类约占总数的3%~5%；而内声外形结构的汉字，仅“进”一例。会义合成语：由多个表义构件组合构成，初等手写汉字中共有89个，占比达29.67%，典型例子包括“家”“医”“教”等。

基于上述汉字构形模式分类，教师可以从直观展示、构件教学等维度改进教学方法，提升教学效果。直观教学法：侧重帮助学生从汉字的整体轮廓与比例关系入手，形成对汉字结构的整体把握。由于全功能零合成语多为基础且构形直观的汉字，教师可先展示无提示图片，引导学生自主识别并描述画面内容，随后将汉字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建立联结，揭示汉字的构形意图，助力学生准确理解字义。构件教学法：适用于大多数仍保留明显构件特征的汉字（如包含“口、亻、讠”等表义构件的汉字）。义音合成语与会义合成语的表义构件往往蕴含丰富语义信息，教师可引导学生将复杂汉字拆解为若干基本构件，剖析各构件的意义、形态及组合规律；同时采用“以一带多”的教学策略，以某一核心构件为起点，辐射式引介与之相关联的多个汉字，鼓励学生通过已知构件自主推导组合字形的整体义涵。

综上所述，基于构形模式分类的初等手写汉字教学法，能够帮助汉语学习者构建系统的汉字认知框架，是其高效掌握汉字书写与应用的科学路径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宁师范大学）

项目式教学模式下的初中物理教学策略探讨

李栋春

在核心素养导向的教育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中，教育工作者逐渐意识到，需借助更契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模式，打破物理学习与现实实践的壁垒。项目式教学因具备注重实践、强调自主探究的特性，成为连接物理学科教学与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路径，为初中物理教学改革指明了新方向。

一、项目引领，任务驱动

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，学生唯有主动构建知识体系，方能实现深度学习。而传统灌输式教学难以达成这一目标，因而需通过小组与任务引导学生自主探索。教师可围绕初中物理核心知识点设计主题项目，如“家庭电路优化设计”，并将该项目分解为“电路原理分析”“家庭用电情况调研”“优化方案制定”等子任务，明确每个任务的目标与时间节点，引导学生依照任务推进学习，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主动构建物理知识框架。在此过程中，教师需及时解答学生的知识困惑，鼓励学生自主查阅资料、开展讨论交流，逐步提升其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增强知识学习的实效性。

二、情境创设，问题导向

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在驱动力，仅靠理论讲解难以维持学生对物理的持续兴趣，而创设具体情境并提出问题，可有效激发学生探究欲望。例如，在“浮力”内容的教学中，教师可以创设“如何让不同材质的物体

二、聚焦核心能力提升，找准教师赋能之“靶”

以教育家精神赋能思政课教师能力提升，需紧扣“政治素养、教学创新、实践担当”三个核心维度，将精神内涵转化为可操作、可落地的能力提升举措。

第一，强化价值引领能力，守住育人“主阵地”。价值引领是思政课的核心功能，需以教育家的育人初心为锚点，筑牢教师的理论根基与政治素养。一方面，教师要主动深化理论学习，不仅吃透教材内容，更要跟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，让理论讲解有温度、有深度；另一方面，要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困惑，针对“躺平”“内卷”等学生关注的话题，用辩证思维引导学生正确看待，将价值引领融入问题解答，避免“空对空”的说教。

第二，提升教学创新能力，激活课堂“新活力”。践行教育家的创新意识，关键在于让思政课从“单向灌输”转向“双向互动”。在教学方法上，可打破课堂边界，采用“案例教学+情景模拟+实践研学”的组合模式；讲解历史时，通过角色扮演还原重要历史场景，让学生沉浸式感受时代脉搏；讲解社会治理时，组织学生走进社区、企业调研，用实践成果验证理论知识。在教学载体上，善用新媒体工具，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短视频、互动话题等，借助公众号、短视频平台延伸课堂效果，让思政教育“无处不在”。

第三，增强使命践行能力，做好学生“引路人”。以教育家的使命担当为驱动，思政课教师需做到“言传”与“身教”并重。课堂之外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，用实际行动向学生证明“思政课有用、管用”；日常言行中，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为范、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引，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思政教师的人格力量。这种“知行合一”的示范，能让思政教育真正被学生接受，实现“立德树入”的深层目标。

总之，教育家精神为思政课教师能力提升提供了清晰的方向，而教师能力的提升又能让教育家精神在思政教育实践中落地生根。唯有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，不断锤炼核心能力，思政课教师才能真正承担起培养时代新人的重任，让思政课堂焕发持久的育人魅力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）

物联网背景下关于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研究

李玲珂

摘要：基于物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，本文针对产业链现代化进程展开研究，从产业经济学角度透彻分析物联网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机制与路径，论述了物联网借助数据互联、智能感知及协同控制技术，重塑产业链价值创造逻辑、加快响应速度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从而促进产业链柔性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。研究提出构建“技术—产业—政策”协同创新体系，加强数据安全治理、培育数字化人才环境等对策建议，为物联网时代产业链现代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。

关键词：物联网；产业链现代化；产业经济学；价值重构

物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大幅重塑全球产业格局。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了物联网，物联网借助设备互联、数据互通以及智能协同，助力产业链从线性架构向网络化、生态化发展。现阶段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仍面临核心技术被人掌控、协同效率欠佳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等挑战。

一、物联网驱动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意义

（一）重构产业链价值创造逻辑
传统产业链的价值创造聚焦于生产制造，依循“要素投入—规模扩张—价值产出”的线性规律，物联网凭借设备互联与数据融合，使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，推动价值创造向“需求洞察—精准供给—价值共创”转型。企业可凭借实时数据灵活调节生产与服务，达成个性化定制与全周期管控，促使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“物质资本驱动”迈向“数据资本驱动”转变^①。

（二）提升产业链响应速度
传统产业链响应需求借助层级传递机制，信息损耗与协同迟滞造成响应周期漫长，物联网依靠部署智能传感器以及实时数据交互系统，创建起覆盖全部节点的动态感知网络，让需求信号能瞬间传导到生产端。企业可借助数据驱动型的决策模型快速对产能布局作出调整，达成从“预测式生产”到“响应式制造”的转型，大幅增

强产业链应对市场波动的适应能力与反应速度。

（三）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
传统产业链资源配置因信息孤岛和组织壁垒受限，常引发资源错配与闲置浪费问题，物联网借助构建数据共享平台和智能分析系统，达成全产业链资源的可视化管控，促使供需双方精准对接产能和潜在需求。这种依托数据流动的协作机制，推动产业链配置从“局部优化”转变为“全局最优”，为产业经济学中的资源最优配置理论给出实践模式。

二、推进物联网背景下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践路径

（一）构建“技术—产业—政策”协同创新体系：突破核心技术瓶颈
针对高端传感器、低功耗芯片这类难题，应构建“产学研用”联合攻关体系。例如，借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助力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开展合作，冲破关键技术障碍，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水平。依托平台企业构建产业链创新生态格局，扶持龙头企业打造物联网开放平台，招引中小企业融入，构建涵盖芯片设计、设备制造至应用开发的完整生态链。如阿里云IoT平台借助提供标准化的接口及开发工具，让中小企业技术难度降低，推动物联网应用加速落地。健全数据安全及标准制定等相关配套政策，建立物联网设备安全认证规范，规定关键基础设施物联网设备需完成安全认证，促使企业增强技术自主能力，推进跨行业标准的相互承认，推动产业链协同前行。

（二）强化产业链数据安全治理：构建可信协同环境
开展加密传输、隐私计算等技术研发工作，保障数据从采集到使用整个流程的安全，运用区块链等技术达成数据的不可篡改及可追溯特性，增进产业链各环节信任水平。搭建覆盖整个产业链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，清晰界定数据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和收益权。例如，编制物联网设备数据分类分级指引，针对敏感数据开展差异化防护，兼顾数据共享与安全风险。参与国际物联网安全标

准拟定工作，助力中国方案获全球认可，如给3GPP、IEEE等国际组织提交中国技术提议，提高中国在物联网安全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分量。

（三）培育数字化人才生态：支撑产业链持续创新
高校应增设物联网工程、数据科学等专业，造就跨学科复合型人才。例如，清华大学开设“智能物联网”微专业，集成计算机、电子、管理等多学科课程，造就既精通技术又擅长管理的创新人才。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协作，实施“订单式”人才培养模式，如海尔集团和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了“物联网学院”，按照企业需求定制课程，达成“招生即招工、入学即入企”的目标^②。依托在线教育平台开展物联网技能培训，增强在职人员数字素养，如腾讯云发布“物联网开发者认证”，利用线上课程与实际操作项目，助力开发者掌握物联网开发能力。

三、结语

综上所述，物联网技术凭借重新构建价值创造逻辑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、优化资源配置效能，成为产业链现代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。未来，伴随物联网与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技术深度融合，产业链现代化将迈向更高阶段：从“数据互联”迈向“智能互联”，从“生态协同”走向“价值共生”，政府、企业与高校要协同合作，一同探寻物联网时代产业链现代化的新途径，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、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。

参考文献

[1] 刘钊，杨佳.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理与进路[J]. 决策与信息, 2025, (09): 5-15.
[2] 孙军.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范式—产业互联网平台与产业链政策协同赋能的视角[J]. 经济学家, 2025, (07): 87-96.

（作者单位：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）

从泰山文化看中华大一统传统样式及其生成逻辑

公秀丽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无论哪个朝代打坐王中原，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，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。分立如南北朝，都自诩中华正统；对峙如宋辽夏金，都被称为‘桃花石’；统一如秦汉、隋唐、元明清，更是‘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’。”^①

二、从泰山文化看中华大一统生成逻辑

李白有诗云：“黄河从西来，窈窕入远山。”山水相依的地理环境，为中华文明诞生和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，产生了早期的大汶口文化。对于中华大一统传统，地理环境是其生成的第一个要件。

（一）地理环境
古代人类克服自然障碍的能力有限，高山沙漠成功地阻断了文明之间的大规模交往，这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在独立的环境中，逐渐积累，顺序发展。中华文明独立发展，一直到近代以前，都没有受到过外来重大文明的冲击、干扰。文化的连续性也因此获得保存，在此基础上，也客观的催生了统一性的文化。地理环境既相对独立，内部又紧密联系。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交流作用和文明的交流，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。

（二）中国人的天下观
传统中国，“中国”是与“天下”紧密结合的。“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，以中国为一人。”^②于是，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，抑或是汉族与异民族之间的关系，都被

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，形成了多元一体、团结集中的统一性”。中华大一统传统表现出怎样的样式，中华民族为何会有大一统追求，本文拟从泰山文化进行解读。

一、从泰山文化看传统中华大一统样式

（一）政治大一统
秦始皇当年一统六国，平定天下，而后，通过“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车同轨、书同文字”等一系列规则，实现了“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”。汉武帝时期，明确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”。秦皇汉武帝继封禅泰山，自此，泰山成为中华政治大一统、国泰民安的象征。《隋书》写道：“天下一统，焚柴泰山。”^③大一统的政治就成为传统中国根本政治形态，大一统正是通过政治大一统从政治的构想转化为历史的事实。

（二）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
泰山是中华民族融合的象征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见证。但是对于历史上的王朝来讲，只有延续华夏文明或中华文明正统，才有资格自居中国。这里的中国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，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。正如葛兆光教授指出的，在文化意义上，中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“文化共同体”，具有文化上的认同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一同性。^④
中华大一统，本质上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。正如